

大兴屠杀调查

遇罗文

一、缘起

遇罗克在1966年写的《出身论》里，列举当权者残害“黑五类”（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份子、坏份子、右派份子）及其子女的手段，有过“残酷的‘连根拔’”一句，指的就是发生在19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北京市大兴县屠杀事件。

我们办的《中学文革报》寿命无奈只有三个月，报纸也只出了七期，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、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，毕竟篇幅太少、时间太紧，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。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，专门收集、揭露“文革”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。

罗克入狱不久，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，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。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，并给他起了个“屠户”的外号。

据说许多地方屠杀“黑五类”，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，而“屠户”所在的村子则不然，除了头一天把老的“黑五类”用棍棒打死、把婴幼儿“黑五类”劈成两半儿以外，对于青少年“黑五类”，关起来慢慢折磨着“玩”。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，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，然后施以各种刑法；对女青年，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，还要进行性虐待。晚上把他们放下来，让他们“休息”，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，好多受些罪。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“黑五类”发出通知，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“批判”。几天之后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。

对于少年“黑五类”，他们也不放过。先是几天不给饭吃，饿到了一定时候，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，看着他们争抢取乐。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，就要折磨这些少年。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。“屠户”们起先对“指示”没当回事，依旧每天都死人。

据“屠户”说，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，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。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。相反，为无辜惨遭屠杀的“贱民”们鸣冤的遇罗克，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！

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，才有简短的报导出现在书刊上，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，1966年8月26日，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，从8月27日至9月1日，县内13个公社、48个大队，先后杀害了325人，最大的80岁，最小的才38天，有22户人家被杀绝。（见《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史》，1986年9月“天津人民出版社”出版）

研究惨痛的历史，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，使社会前进、民族进步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，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！

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“北京市档案馆”，在那里竟找不到“文革”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。有关“红卫兵”抄家、打死人，农村的屠杀行为，只言片语都没有。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：1967年3月18日，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（俗称“318布告”），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。这“11种人”后来成了专用名词，分别是：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、坏份子、右派分子、资本家、黑帮分子、反动军官、伪警察、伪宪兵、特务。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，档案馆里却没有。幸好那里有1967年3月23日“市人委、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”，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，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，到67年还没有结束。“报告”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，有部份人又回到北京，其中一半多是“11种人”。“报告”内称为“符合处理办法”（即318布告），还应该继续遣送。

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，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，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。

把有“问题”的人撵出北京，要追溯到1959至61年之间，当时的北京市长、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：要把北京建成“玻璃板、水晶石”。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。“文革”一开始就施行遣送，可见是必然的。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，想找到有关“玻璃板、水晶石”的蛛丝马迹，一无所获。

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，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。

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，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。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、胡德福，这两个人还活着，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。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、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。

很不容易，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，不料碰了钉子——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“上级”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。

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，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，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。而更大的意义，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——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，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。

如果以1966年5月16日作为“文革”的起点，六月初，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“红卫兵”组织，后来人称其为“老红卫兵”。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。“红卫兵”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。两个口号是：“造反有理”和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。不齿

于人类的行为是，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、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。



“红卫兵”们在学校里打校长、老师们，“砸烂”了“修正主义教育体制”还不过瘾，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，开始了“破四旧”和血腥恐怖的“抄家”活动。8月18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“老红卫兵”。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载上了“红卫兵”袖章。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，是不是“文质彬彬”的彬，说了一句“要武嘛”，宋因此改名为“宋要武”。“818”以后，“红卫兵”名声大振。愚昧、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，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、灭绝天良的心灵。

所谓“抄家”，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，即使是孤寡老人，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，连碗筷、被褥都不剩。而且，“抄家”还要伴随着“打人”，手段残忍至极。“抄家”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“阴阳头”，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。说是“剃”，其实是连剃带薅，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，连头皮都给撕下来。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、淌着鲜血的老人，还在被游街。更残忍的，还要给“洗”头，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。

东四一带有一家“资本家”，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，又强迫儿子去打，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，自己也疯了。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，在沙滩街上，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、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，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，直到把老太太踩死。8月25日，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，发生了一件所谓“阶级报复事件”——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“房产主”，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“红卫兵”。这个“房产主”被打死。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“红卫兵”组织，正在寻衅的“小将”们哪里肯放过，数千名身着军装、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，在这一带“血洗”了七天，无数人惨遭毒打，许多人死于非命。这就是震惊北京的“榄杆市事件”。这次活动中，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“地主婆”的家（孤身一人的寡妇），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，从她脖领灌下去，直到肉已经熟了。几天后，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。南宫口胡同的邵家，在

清朝做过道台，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、白糖，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、吃白糖，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，那比挨打都要难受得多。

1966年8月下旬，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，这股杀人狂潮迅速辐射、流传到北京郊区各县，包括大兴县。

二、采访老韩

2000年2月29日下午，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。经朋友介绍，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。

老韩今年六十多岁，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，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，他的年龄和处境，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。

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，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，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。

果然，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“文革”那段惨案的，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。他们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是不是问‘831事件’？”

起先我一愣，不明白“831”是指什么，经老韩解释才知道，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66年8月31日夜里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，第二天（9月1日）上午，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。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“831事件”，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，为了叙述简明，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。

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——我一直以为屠杀“地富”从大辛庄兴起、持续了好几天，看起来，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这天。

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，规模却是全县最大的——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，它们分别是：黎明、中心、昕生、红升、杨各庄、东黄垓；以公社为单位来说，死的人也最多。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。

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，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，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。也有反对屠杀的，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据老韩说，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（女），贫协主席是李树珍，两人是堂兄妹，平时很看重邻里关系，不擅长搞“阶级斗争”那一套。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，在庙里出生，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。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，他说什么也不干，理由是不愿得罪人。

1966年8月31日晚，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，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“九人小组”。“九人小组”还包括公社

副书记李自永、李冠清。公社正书记贺云喜（音）因为是“地富”出身，被“九人小组”关押着，也险些被杀。

会上传达了高、胡从天堂河农场（劳改农场）带回来的新“精神”，让各大队当晚把“地富”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。

李树清回到大队，已经吓得腿软，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。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，他说：“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，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？咱们都没杀过人，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。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，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。”张万义是世代贫农，自己又当过“八路”，所以说说话硬气，也敢于直接反对。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，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，没有人再主张屠杀。

李树清说，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，西白疃“地富”多，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，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。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，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，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，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。

老韩承认，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，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。9月1日以后，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，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“胆小怕事”、“向阶级敌人妥协”。

韩夫人说：“这村的‘五类份子’们可吓坏了，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，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。他们也豁出去了，说，要是来人杀他们，就和凶手拼命。”

难以想象，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，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！

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“黑五类”的遭遇，韩夫人还记忆犹新。她说，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，有用棍棒打的、有用铡刀铡的、有用绳子勒的，对婴幼儿更残忍——踩住一条腿，劈另一条腿，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。

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，各处方法都相似——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，再一个个叫出去，出去一个杀一个，被关的人并不知情，直到杀光为止。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，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，第二天早上出工，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，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。

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，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，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。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，直到井快塞满了。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。后来，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——用绳子套在脖子上，连拖带勒，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。

靠近公社的大队，好几个都把“黑五类”杀绝了。

我问，那口井还在吗？

她说，没有多少天，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，村里人把一部份尸体捞出来，埋在了苇塘，然后把井填了。

老韩夫妇在当时，算是“根红苗正”的贫下中农，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，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，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？

他们马上想到了“四清”，想到了那时大讲、特讲的阶级斗争。那时就让“地富”子女斗自己的父母，检举父母的“罪行”的，就受到表扬，奖励去“人大大会堂”参观；不愿斗自己父母的，也被划成“地富分子”——说明从很早起，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，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，难免丧失了人性。

“到了文革，一个劲儿地宣传‘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他就不倒’（毛泽东语录），至于怎么打，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——批斗也是‘打’，拳打脚踢也是‘打’，把人打死也是‘打’。反正上级有了命令，谁也不敢不执行。”

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——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，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。

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，有一个十六、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，仨人都在上中学。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，因为穷，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，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份，但是北贺村文明些，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。

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，地主出身，从小离开家，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，后来投降，55年回乡，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“起义证书”。韩宗信把“证书”悬挂在屋内上方，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。

“文革”前的“四清”运动中，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，把他拘留了几十天，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。

8月30日，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，特意去看望他，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。

改革开放以后“落实政策”，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，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。

偿还如此少的钱，难免让我感到吃惊，韩夫人却感慨地说：“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，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，大队想给都没处给。”

人总相信因果报应。我禁不住脱口而出：“这些作恶的人，没得到报应么？”

老韩说：“有什么报应？主谋高福兴、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，‘九人小组’里的其他人，该当干部还当干部，没听说谁受到处分。死了的人，连家属都没剩，谁替他们喊冤？”

韩夫人说：“反正好几年，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——怕给宰了。”

三、来到大辛庄

2000年3月3日中午，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。

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，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，划分成四个大队，分别是黎明、红升、昕生、中心，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。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，没有明显的界限。

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，住在红升大队，紧挨着黎明大队。老李今年70岁，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，四清时罢掉了他大队书记职务，73年才给予恢复，80年辞去书记职务。

这天是个混沌天气，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，空气质量5级，污染程度非常严重。

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，俨然一个繁华的小镇——乡政府、医院、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，几个商店花花绿绿，路两旁一个挨一个的摊商。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，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——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，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，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？

老李虽然70岁了，却很健谈，思路也十分清楚。他告诉我，在8月31日那天，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，就被杀了106口人，最老的八十多岁，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。

四个大队之中，黎明杀了六十余人，人数最多；中心、昕生各二十余人；红升行动慢一些，只杀死两个人，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。

9月1日上午，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、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，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。但是力主屠杀的公社主任高福兴、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，附近的杨各庄、东黄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，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。

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，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，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；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，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。按“文革”初期的形势来看，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“公安”和刚刚夺了权的“文革领导小组”（或叫别的名字）。从高、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（天堂河劳教农场）来看，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，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。

县委出面制止屠杀，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，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“接受批判”的境地，自顾尚且不暇，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“革命行动”？

据传闻，此事惊动了中央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发了话，命令停止屠杀。作为执政者来说，自己的“太子”、“衙内”们杀些人，他们是容忍的，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，他们还不好接受——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？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，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。9月5日，两报一刊发表了《要文斗不要武斗》的社论。

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但是作用不大。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，是毛泽东、林彪赞扬的红卫兵；受害的一方，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。况且这种压迫、敌视行为，从49年以来就建立了，59、61年又两次得以提升，以至喊出“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”的口号，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“贱民”阶级。“老红卫兵”从小受到的教育、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，都是“一个‘阶级’应该压迫另一个‘阶级’”这一套，他们认为迫害以至处死“阶级敌人”及其后代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所以，9月1日以后，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，但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在继续之中。

就在大兴屠杀之后，1966年9月15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，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：“红卫兵战士们，……你们斗争的大方向，始终是正确的。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！”“你们的革命行动，震动了整个社会，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。你们在大破‘四旧’、大立‘四新’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‘权威’，那些吸血鬼、寄生虫，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。你们做得对，做得好！”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制止。

像北京城里的“老红卫兵”一样，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非常残忍。

从杀人最多的黎明大队，可略知杀人的过程。他们先把年轻的“黑五类”杀掉，做得尽量隐秘，防止引起暴动。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，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。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。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，打手们到各家搜，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，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。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“万人坑”。有的小孩没被摔死，从“万人坑”里还想往外爬，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，再把他打回去。见了女人，还要扒光了衣服。

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——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，马村的“阶级敌人”举行了暴动，杀了贫下中农，所以“我们”也要把“他们”杀光。五、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，全是听高、胡二人的传达和煽动。

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，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，到9月1日已经杀了34人，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。

高、胡二人召开完“动员会”，已是深夜，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，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“阶级敌人”的，按“反革命”论处。

高、胡在公社大院坐镇，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。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，尽管气氛恐怖、压力极大，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。老李告诉我，公社南面8里远，有个西梁各庄大队，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，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，竟连夜去中南海、北京市委上访，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，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“黑五类”的性命。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，我决定去采访他。

临走，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“万人坑”，老李说，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——井口都被铲平了，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；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，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，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。

我感慨地说，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，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。

老李说：“打人以后的好几年，街上都是冷冷清清，一过傍晚，没人敢在街上走。后来才恢复了热闹。”

从老李那里知道，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，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：高福兴、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（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，在“干校”的6年抵刑期，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，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）；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年徒刑，服刑时在狱中自杀；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，出狱后两、三年病死；东黄垓大队“文革主任”被判监外执行（时间不详）。

我所采访的人，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。

但是，他们没有“老红卫兵”那样的好运，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——血统论主宰着一切！

趁天色还不晚，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。77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，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。提起当年的事，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，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，正想再往下说，语言障碍更加明显，急得他烦躁不安，谈话只好中断。

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，当年去公社开会、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，如今两个已经去世，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——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。

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，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，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，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。

老刘今年61岁，“文革”那年他27，在大队干部里，还算比较年轻的。

据他说，66年8月30日，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，下午回到公社，刚一下车，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。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，老刘带着社员回家。

这个会，就是要各大队屠杀“五类分子”的动员会。会议整整开了一宿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干部们才回到各队。会上说，北边有股潮流——“阶级敌人”要杀贫下中农，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，从8月31日开始，杀光“五类分子”。

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，知道自己并没有处死他人的权力，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反常。他们采取的办法是，到市里咨询一下，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“阶级敌人”。

他们先到了国务院，没有人来接见。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，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，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。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，受到了李（女）、王二人的接待，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；这两个人还说，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，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。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，一定会向大兴县过问此事。

老刘说，他们从北京回来，认为得到了明确的指示，肯定自己做对了，于是召集“黑五类”们开会，传达“十六条”精神（其中有一条是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”），让他们安心。这些“黑五类”们，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，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，一个个三分像人、七分像鬼，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，感动得不得了，一个劲地表示，今后一定好好干活，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
9月1日以后，县长傅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，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，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，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，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。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，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“阶级敌人”妥协，而且还强调，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。

68至69年间，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，见到高福兴、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。70至71年，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，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。据说在判刑前，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。86年，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，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，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。

四、北臧公社

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西部，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，从66年8月27日就开始了。有三个大队杀人，分别是：新立村死53人，马村死34人，六合庄死11人，共计98人。

98年出版的《那个年代中的我们》（远方出版社）一书，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《五进马村劝停杀》，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：

“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，有正房5间东厢房三间。我们排队进院时，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，死人横躺竖卧，鲜血染地，惨不忍睹。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（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）。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，耀武扬威，个个手持木棒、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，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‘枪支’、‘地契’、‘变天帐’；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，凶器就会伴

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。被打死的，等车外运，没被打死的，倒地呻吟。我看见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小男孩儿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，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，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。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：‘快说，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？’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：‘不……知道！’‘我叫你不知道！’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，正砸在背后的手上，只听‘扑’的一声，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，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，哗哗地往地上流……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……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，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，这时，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，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，接着审，她不言语，被两皮带打躺在地……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，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，一挣扎掉在地上，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，又装在车上运走了……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‘准备反攻倒算’的枪支，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屋顶棚内。于是，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。到家后一找，顶棚里没有，又指挖房山、影壁、院墙，均未找到。小伙子又被打，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。于是，又带他去坟地，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，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。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，也不管他死活，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……

“……他们在村内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设四个监狱，分男老、男壮、妇女、儿童四监，另设一个刑场，随捉随人，随提随审，随杀随埋，真乃一条龙行事。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‘坏人’入狱至9月3日，长达一周的时间，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，但也食不饱肚。在放人的这天，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，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，个个争抢食之，狼吞虎咽，那情景令人落泪。”

2000年3月20日，我见到了张连和先生，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108人的敬意。1966年9月1日，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，到马村劝阻杀人。杀红了眼的民兵们“手持木棒、铁棍，有的还手持铁锹、刀子”对来人“如临大敌，不准前进一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原来，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，不准出入。”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，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。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，从下午直到半夜，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。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：“不叫杀了，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？”、“要求杀绝，不留后患”。

事隔三十多年，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。那个年代，想给谁扣个“帽子”非常容易，向着“阶级敌人”说话，起码算得上“阶级立场”有问题。这种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。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，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，可见当时的恐怖场面。

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，他难过地说：“都死了。小孩失血过多，不久就死了。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，身上扎得乱七八糟，弄到地面，又挨了一阵铁锹、棍棒的毒打，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。”

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“屠户”，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。

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，据他说，67年王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，从此再也没有消息。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，均未得到回音。

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，我又拜访了“文革”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，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，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。

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，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、副村长，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。49至63年间，给老王定为中农，到了63年以后，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，把他的成份改为地主，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——幸好北臧村没有杀人，否则他家绝对逃脱不了。

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，老王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，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，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，一个家在大辛庄的听生叫谭润方，死得都非常惨，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。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。

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，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，也都死于非命。王夫人的表姐夫在“镇压反革命”运动中被处死，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。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，村里的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，单位没放，总算躲过了这次劫难，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。他们上中学的妹妹，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。

直到今天，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，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——55岁了，还过着单身的生活——她想起亲人的遭遇，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，自然对家庭也没有了兴趣。

老王的大儿子，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。66年8月27日那天，他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，走到了新立村。村干部把村里的“黑五类”们也押来陪斗，让“黑五类”们跪在玻璃碴上，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。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，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“黑五类”的头上、脸上乱打。

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，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——他们虽然游斗校长，并没有想要他的命。

“黑五类”们满头满脸的鲜血，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，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把“黑五类”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。

行凶的动机，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，甚至是为了一点儿私利。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，论成份，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，杀不杀这一家，村干部很有争论。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：“别杀我们，我们不为父亲报仇。”一个姓田

的不由分说，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，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。也有的人借过“五类分子”的东西，急于杀人赖帐。更有甚者，霸占“黑五类”妇女，美其名“给你换换成份”。

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。在新立村，有个赶车的把势，在装运尸首的时候，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，他看她可怜，为了救她，把她藏在车辕底下。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，女孩儿苏醒过来，被别的打手发现，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。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，扔下鞭子不再干了。

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，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。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还人的屋门口，把被害人叫出来，被害人刚一出屋，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，两边使劲勒，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，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。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，人一出来上去就电，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，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……。

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，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，凶手毫无顾虑，可以为所欲为。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。在马村，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，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，怀中的小孩儿说：“奶奶，迷眼。”老人说：“一会儿就不迷了”……。

五、结束语

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，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，总是难以克制愤恨、悲凉的心情。所以愤恨，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，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；而且，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所以悲凉，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，谁能保证，下一个不会是自己？而且，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。

不能惩恶，谈不上社会的稳定；不会忏悔，就没有进步的可能。

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：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？

在采访的时候，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，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——周围都是沙包地，惟独那里是胶泥地，产粮多；那里还是个“文化村”，出过许多“文化人”。

这么一个生活富足、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，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？那里的人怎么了？

中国人怎么了？

我想，通过一个一个地区的调查，我们会解开这个迷团。

文革与“暴民意识”

遇罗文

许多人在探讨今后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什么，尽管答案可能不止一个，但是我认为“暴民意识”是不可忽视的隐患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学泰先生对“游民”的特点做过精辟的总结：

一、强烈的反社会性；二、政治斗争中的主动进击精神；三、重视帮派不重是非；四、失去了角色位置，因此也就没有了角色规范，主流社会成员所遵守的规范，对他们来说无所谓。

“游民”是产生“暴民”的土壤。至于“暴民”，就更加仇视传统社会的游戏规则，具有强烈的阴暗心理和破坏情绪，绝对不讲人权和人性。

中共建政前，充份利用了游民的力量；所以建政后，宣扬和歌颂的都是些农民起义、暴力革命、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和队级斗争那一套。四九年以来的历次整人的运动，无一不是充斥着反人权、反人性的色彩。

“文革”中的种种暴行，就是“暴民意识”的又一次大爆发。如果有人对“暴民”还没有足够的感性认识，我把我的一次社会调查介绍给大家，自然就一目了然了。

众所周知，“文革”中比较骇人听闻的屠杀有三处：北京、湖南、广西的集体屠杀，广西还出现了吃人的现象。遇罗克在六七年发表的《出身论》里提到过“连根拔”，就是指大兴县把所谓的“阶级敌人”连同父母子女、不分男女老幼，全家人一个不剩杀掉。后来报导了大兴事件和死亡人数的，有八十年代严家祺、高皋先生的《十年动乱史》；再后来更详细一点儿的是在九七年张连和先生在《那个时代的我们》中一篇数千字的文章《九进马村劝停杀》。此书的文章都是回忆“文革”期间的事，可惜刚一出版即成为禁书。我是听朋友介绍的旧货市场买到撕了封面将要化纸浆的一套。

遇罗克很早就有个愿望，把“文革”中的“红卫兵”残暴行为编成一本书。他多次对我说过这个愿望。既然他过早地牺牲了，我认为有义务完成他的遗愿。恰巧广东的林贤治先生在九九年底向我约稿，于是我对北京大兴几个公社做了详细的调查。

在严先生的那本书里，介绍的死亡人数三百多人是比较准确的，而且这还仅仅是在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一日以“连根拔”的形式死亡的人数，不包括其他方式打死的“阶级敌人”。

我的调查十分困难，这工作也许够得上现在最时髦的所谓“收集情报罪”。所以说“也许”，是因为在中国谁也说不清“情报”包括什么。

我先打算从官方渠道了解事件真相，但是北京档案局以及大兴县档案馆都找不到任何有“文革”特色的资料；我又设法找那些参与、策划屠杀的人，他们被告知不许接待采访者。好在许多当年亲眼见到屠杀的人还活着，我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。

许多令人发指的丑恶事实我就不一一列举了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三件：一件是一位十六、七岁的花际少女，她只是个中学生，就在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的路上，被一群暴徒打死了；另一件是一个赶马车的车把式（贫下中农），发现有个小女孩没被完全摔死、还有口气，就动了恻隐之心，将她藏在车厢下边，准备偷偷运往别处。不料小孩苏醒后一活动掉在了地上，被旁边的暴徒发现，上去一铁锹就像拍苍蝇一样把她拍死了。最让人震惊的是第三件。在屠杀过程中，年轻力壮的被打死得比较突然，为的是怕他们反抗，比如趁其不备用棍棒打头部，或用铁丝勒脖子、用电电死。等年轻人死光了，对老人、孩子可就没顾虑了，往往是说白了让他们去屠杀现场送死，甚至用活埋这种折磨人的方法让他们慢慢等死。其中让村民永世难忘的是一位老奶奶，抱着不懂事的孙子，当暴徒往他们身上扬土的时候，小孩儿说：“奶奶，迷眼。”老人在临死前还安慰他说：“一会儿就不迷眼了。”

多么凄惨的一幕！

在这种场面还能继续下毒手的，就是典型的暴民。

与大兴事件发生的同时，北京市内的崇文区榄杆市发生了所谓“阶级报复”事件。李文波老人因为不堪忍受红卫兵对他夫人的虐待，拿起菜刀准备自卫，据说红卫兵在争夺菜刀时划伤了手，以“阶级报复”为借口，有警察和军人参与，当场活活打死了李文波，几天以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，又将已经死亡的李文波和他无辜的、还没有被打死的夫人在十万人大会上宣判了死刑。还是以同样的借口，整个崇文区立即处于红卫兵暴行的恐怖当中，几天内折磨致死的人起码数以千计。李文波的儿子告诉我，他父亲被打死的当天，他也被关进崇文分局，第二天把他转押到其他监狱时，发现头一天还空着的几百平米的院子里放满了死尸，连走路都困难。那是当天来不及送往火葬场的一部份死难者，有大人也有小孩儿。周恩来还接见了虐待李文波的几个红卫兵，夸奖他们是英雄。

明明是杀人的恶魔，还为自己卑鄙的行为找借口，这是暴民与政权结合的必然产物。

我在调查时恰巧在网络刊物上见到胡平先生的文章，说要为遇罗克建碑立像，我突然想，对这些默默无闻含恨惨死的冤魂，不是也该立碑纪念吗？无情的事实正相反，一切屠杀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——当年填满了死人的水井已经建起了房，埋过人的“万人坑”（当地人的称呼）已经被推土机堆成了平地、种上了庄稼。令人气愤的是当年策划屠杀行动的凶手——公社干部高胡二人，如今还享受着退

体人员的待遇！即使惩罚了他俩也不够公平，因为比他们罪行更大、同样犯有反人类的恶魔，有的还被中共奉若神明，有的还拥有着非同小可的实权。

在去年出版的《苦难的代价》（作者穆玉敏女士）一书中，有一位多年在北京公安系统工作的人透露，“文革”时昌平区打死的人比大兴县多，只不过不像大兴县死的人那么集中。这些杀人的凶手，至今也没有听说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。我所居住的昌平区燕丹村，隶属北郊农场，“文革”时西边村子打死了三、四个人，农场领导来动员说：“毛主席说，东风必须压倒西风。”就是根据这句话，燕丹村立刻打死了七个人。来动员的这个领导，不但事后没受到制裁，多年后还升了官。

“文革”至今已经三十五年了，居然那么长的时间过去了，还只能在地球的另一侧，在一个与事件毫无相干的国家召开一个研讨会，而事发地却在狂唱“文革”歌曲、大演“文革”时期的“革命样板戏”，实在是中国人的不幸和绝妙的讽刺。在中国大陆由于回避“文革”问题，当权者没有起码的反思，甚至在今年三月五日，中宣部发出文件，禁止出版界出版有关“文革”及历次整人“运动”的作品（我的一部书就因此遭难），所以中国人更大的不幸是以后还要受“暴民意识”的毒害，说不定在某个时期连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。

中共政权如果是一个理智、负责任的政府，应该及早地限制“暴民意识”的生存空间，向法制社会靠拢。“暴民意识”无论对有权势的人还是对平民百姓都是危害，“文革”中不少当权者挨整就是例子，何况那时毛泽东还有绝对的权威，最招民愤的腐败现象也没有今天这么公开和严重，许多作恶多端的高官反而得到寿终正寝的结局。

历史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。下一次“暴民意识”的大爆发最先倒霉的可能不会再是“黑五类”，也许是贪官污吏（贪官污吏也应受到依法惩治，不该残害），但是可以肯定地说，最终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善良的普通老百姓。所以今天探讨“文革”的种种现象，具有非常重大和深远的意义。

身居异国他乡的专家学者们，无论中国将来如何混乱都涉及不到诸位，却还能坚持不懈地研究探讨中国的过去和将来，值得令世人所钦佩。无论因为诸位的努力使中国走向法制、民主的良性社会，还是因人力有限，无法扭转乾坤，都是为中国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二姨

遇罗文

王桂兰，女，北京市民。因丈夫赵长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当过交通警察，在文革中被定为“历史反革命”。他们夫妇必须出门戴着羞辱性的“历史反革命”和“反革命老婆”

的标识牌。由于这个牌子标明的“反革命”家属的身份，王桂兰有重病却被医院拒绝医治。王桂兰走投无路，服大量安眠药自杀。

姥姥只有我母亲和二姨两个女儿。母亲刚参加工作，姥爷就去世了，而二姨家境又贫寒，所以姥姥一直和我们一起过。

二姨和母亲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——母亲好学习（两次去日本留学）、事业心强、喜欢轰轰烈烈、心胸开阔、交际广泛，她身体健康好运动，打篮球、排球、网球、爬山、划船、骑自行车……她练就一副男儿性格，不愿受拘束，姥姥姥爷拿母亲当儿子待；二姨从小体弱多病、不爱上学、不爱参加工作、心眼小、愿意过温馨的小家庭生活、不善于交际。母亲是左嗓子，吹拉弹唱一窍不通；二姨酷爱戏曲，听到评剧就陪着落泪，听到京剧就跟着哼哼。年轻时曾决心去当演员，但是姥爷觉得自己是京城营造业知名人物（北京著名的“长安大戏院”——第一座无立柱的两层剧场，就是他设计、施工的），认为女儿做“戏子”有失自己的身份，坚决不同意。

如果是母亲，可能早就叛离了家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而二姨天性怯弱，毫无反抗精神，及至姥爷去世，二姨也早已超过了学戏的年龄。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一终生的遗憾吧，她嫁给了同样酷爱戏曲而且拉得一手绝妙的京胡的姨夫。姨夫家境贫寒，婚前，二姨常常在吃饭的时候，多盛些饭菜藏起来，偷偷送给姨夫吃。

姨夫对京胡的爱好，简直达到了“癖”的程度——他经常半夜两、三点起床，赶到京剧名角的琴师家，站在墙外偷听人家怎样练功。

他每年春节，都要去我家演奏一次。尤其是他拉的京剧曲牌“夜深沉”，每次我们全家老少都听得如醉如痴。演奏完了，窗户外面准趴满了邻居们好奇的脑袋。可是，艺术不能当饭吃。他必须去工作，他当过交警、拉过洋车、去协和医院做过会计……一旦业余爱好和工作发生冲突时，总是工作让位，于是什么也干不长。刚结婚那两年和我们一起过，可是姐俩的脾气、两家的生活习惯又那么不一致，所以最终还是分开了。母亲介绍他到摩托车厂当了一名会计，以后再没有离开那个单位。

做家长的可能都是这样——子女当中，越是“没出息”的、越是离自己远的，她（他）越是惦念。

姥姥一到二姨家，尽管房间只是阴暗潮湿的狭长的一条，尽管只能容纳三个人的一个通铺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，她仿佛感觉这才是她最舒心的地方。

二姨喜爱生活，愿意收拾家务，这个简朴的家被她安排得特别温馨——仅有的几件家具擦得锃亮，洁白的抹布永远叠成整齐的方块儿，干干松松地摆在桌角；墙上贴着几张喜气、文雅的年画；枕边是线装的、发黄的《红楼梦》、《三侠五义》等两三本书，还有几本租来的古装小人书；茶杯、饭碗都是那么小巧玲珑，让人不渴不饿都想用它们喝水、吃饭；炒菜的铁铲儿磨得只有铜钱那么大，使用起来就像在玩“过家家”。

二姨不像母亲说话那么直，嘴出奇地甜，往往说得姥姥心花怒放。姨夫和二姨说话常用京剧的“道白”：

“娘子，给我两毛钱我去买猪肉黄酱是也——”

“相公，早去早回不要延误时间哪——”二姨随声附和。逗得我哈哈笑个不停。可惜他们不会编唱词，只能念，不能唱，否则和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《戏迷》别无二致。

姨夫好说笑话，对我们晚辈又十分和气，我特别愿意和他相处。别看我家的伙食比姨夫家的好，我反倒更爱吃他家的饭。最难忘的是姨夫用“支锅”（陶制，像锅，扣在火炉上，底部密布圆孔）烙的饼，又香又脆。

有一回姥姥和二姨去串门，姨夫留下来给我做饭吃。做饭前，他先征求我的意见，问我想吃什么。看我说不出来，就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咱们吃‘小金鱼’怎么样？”我问“小金鱼”是什么饭，他故意卖关子不肯说，吊我的胃口。等到他做的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就是用面做的“拨鱼”。在家的话，可能我对它没有一点儿兴趣，可是跟姨夫在一起吃，觉得格外香。

回到家，想让母亲也好好奇，特意炫耀我吃了一顿“小金鱼”，不料母亲平淡地说了声：“奥，你们吃的是拨鱼。”弄得我大失所望。

在了解小孩儿心理方面，我更佩服姨夫和二姨。善解人意的二姨有一件让姐姐永远铭记的事：

“天色忽然暗了，雷声隆隆、乌云翻滚，暴雨就要来了。我和邻居的两个女孩子，刚开始在院内一角过家家，此刻只有扫兴地回屋。

‘还想玩儿吗？’二姨温和地说，‘来，我给你们出个主意。’

她支起一把大的红油纸伞，用几只木凳、小板凳、洗衣搓板，在房檐下、墙根前搭起了一个有棚的小屋。她用棉花搓个灯捻，往小瓷盘里倒了些花生油，做了一盏小小的油灯、点燃，摆在‘小屋’里的‘桌子’上。哦，我们三个小姑娘，欢愉得无法形容！大女孩坐在中间，扶着伞把，我们两个小的紧挨她坐在两旁。几张凳子围成的‘墙’，把我们围在当中。我紧搂怀里的毛巾娃娃，瑟缩起肩膀，抵御着风雨的凉气，听着唰唰的雨声清脆地打在纸伞上。院子里满是雨泡泡，而我们的‘小屋’却干干松松的。我的好娃娃、乖孩子，你暖和地偎在妈妈怀里，露出小脑袋，看看这有趣的情景吧！看那摇曳的小油灯，在昏暗的雨帘里，发出多么诱人、活泼的光焰！”

二姨有严重的哮喘病，不犯病的时候，经常到我家来。孩子们见她来了，都高兴极了。哥哥还小的时候，二姨总是先和他温习唱过多次的京剧，等二姨满意

了，就该满足我们的要求——讲她拿手的《济公传》——每次都让我们笑疼了肚子、直不起腰。

姥姥偏疼二姨，也感慨他们夫妻的和睦。当初二姨要嫁给姨夫，姥姥可能也不赞成过，如今看到他们虽然生活并不富裕，却能够相亲相爱，对她也是个不小的安慰，跟亲戚们常说：“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呀……”

由于身体不好，二姨几乎没有工作过，自然谈不上犯错误，姨夫又是穷苦的出身，按理说在“文革”时应该平安无事，可是灾难并没有饶过他们。能找出来他们的全部“罪过”，就是姨夫在解放前当过半年的交通警。

老实人总是最吃亏的。假如姨夫自己不坦白这段历史，谁还能记得他当过警察？况且过去又没有户口档案。结果“文革”一开始，就把他定成了“历史反革命”，免去了他的会计职务，下放到车间当一名没人爱干的“炉前工”。

这是钣金车间最苦最累的工种，负责给铆工提供烧红的铆钉——一旦铆钉烧到了合适的火候，必须尽快地把它们一个个从火炉里夹出来、送出去。他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器，要一刻不停地重复几百上千次一样的动作，一批完了，稍做休息下一批铆钉又到了火候。之所以这么紧张，是因为稍一拖延铆钉就会烧化，提前取出铆钉又太硬。夏天就不用说了，即使冬天，在炉前站久了，皮带的金属扣都烤得火烫，经常把胳膊烫出燎泡。

他们老老实实在地绣了标明“身份”的布牌，缝在衣服上——浅色衣服是黑布白线绣字；深色衣服是白布黑线绣字。他们没有母亲胆儿大，敢在没熟人的地方换上没布牌的衣服，而是走到哪里都戴着“身份”——“历史反革命”、“反革命老婆”。

二姨的哮喘越来越厉害，根本离不开医院，可是大夫看到她的“身份”，不敢给她看病、开药方，有时候没进医院的大门就被轰出来了。更让她绝望的是，到一家亲戚那里去串门，本来想诉诉苦闷、得到安慰，没想到人家见了她的“身份”，惟恐带来麻烦，硬是没让她进门，还说了些不中听的话。我家，随时有被抄的危险，她自然不敢登门。

病痛、羞辱、担惊受怕，让二姨卧床不起了。有人送来了口信，姥姥去二姨家照顾她，同时也为了躲开抄家的恐怖。

几天以后，我家就遭到了抄家的劫难。“红卫兵”押着母亲快到家的时候，得到了邻居小孩的报信，姐姐躲到了二姨家。

此时二姨住的是公婆留下的一间宽敞的北房，有两户邻居但自成一个独立的跨院。在屋门以外，姐姐就听见二姨每喘一口气带来的呻吟和姨夫的叹息声。

姐姐轻轻敲了敲门上的玻璃，姨夫掀开玻璃后的布帘，仅仅露条窄缝，惊恐地辨认来人是谁。看清了是姐姐，急忙让她进屋，又急忙关严了门，就像做了贼。他狐疑地打量姐姐，问道：“是不是被抄了家？”

姐姐不想增加他的恐惧，装做没事似的说：“没有，我就是来看看二姨的病。”

姨夫突然惊讶道：“噫！你怎么还敢穿裙子？”然后规劝说，“这年头还是少走动好。你不拉小提琴了吧？别拉啦，我的胡琴都让人砸啦。”

姥姥痛苦地看着女儿每分每秒地受着罪，想不出解救的办法，只能用手轻轻地拍着二姨的后背，希望憋在气管里的痰能够痛快地吐出来。

二姨已经几天不能平躺，只能倚坐在床上费力地大口喘气。因为缺氧，浮肿的脸变成了紫红色。见姐姐来，她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艰难地点点头。呆了一会儿，姐姐实在不忍心看着二姨的难受样，起身告辞要走。

“孩子，”姨父也站起来：“我就不留你啦。”

“等等……”二姨从剧喘中，挣扎着指指床边的五屉柜：“抽屉……开开……衣服……”她艰难地说出这几个字，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，一口口地吐着带血丝的痰。

姨父不解地拉开了一个大抽屉，里面都是二姨的半新不旧的衣服。

“米……米黄色的……”二姨紫胀着脸，无比艰难地指指那些衣服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姨父找出一件米黄色咔叽布西式旧上衣，二姨摇摇头；姨父又找出一件九成新的、同样质料和样式的上衣，二姨点头：

“穿上……送你的……”

“二姨，您留着穿吧。”

“穿上……”她闭了闭眼，又是一阵抖肺搜肠般的咳嗽。姥姥心疼地流下了眼，一手轻轻地拍她的背，一手用手绢擦去泪水。

“既然你二姨想送给你，”二姨父递给姐姐：“你就穿吧。她或许怕你冷，穿上吧。”

姐姐只有穿上了，正合身。几天以后她才明白，那是疼爱她的二姨与她永别的纪念品。一天夜里，二姨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。

我和弟弟帮助姨夫料理后事，正碰上街道积极分子来通知姨夫搬家——因为姨夫家只有一口人了，又是“反革命”，无权居住二十来平米的北房，让他搬到胡同里另一个大杂院儿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南房去住。

来送通知的是个很会说话的老太太，她看周围没有外人，还安慰了姨夫几句：“您不用太难过，就当是她出了差，出了趟长差。”“住小点儿的房子还剩房钱呢。您说是吧？”

姨夫苦笑着陪她说说着话，直表示马上就搬家。倒是人家没催得那么紧，允许他拖延几天。

我们以为姥姥失去最疼爱的女儿，一定难过得死去活来。没想到她倒很坦然，对我们说，死了比活受罪强。

没有了二姨，姥姥把姨夫当儿子看待，经常去看他，帮他料理家务。后来我家遇到了新一轮灾难，姥姥就躲到姨夫那里去住。

姥姥去世以后，我们又都在外地，和姨夫断了联系。七十年代，苦闷、孤独的他鬼使神差般地又匆匆找了一位农村户口的老伴。没想到此次婚姻没有给他带来幸福，反而让他更加苦恼。七八年的一个夜晚，他和二姨一样，也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。

一生清贫简朴、胆小怕事的二姨、姨夫，终于到阴间团聚去了。生前脾气、爱好处处相同的一对恩爱夫妻，想不到连死的方式都那么相似。

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

作者：遇罗文 （摘自《遇罗克遗作与回忆》一书）

提笔之前，桌上放着一份再审判决书。全文如下：

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

（79）中刑监字第 1310 号



遇罗克，男，一九四二年生，汉族，北京市人，家庭出身资本家，本人成份学生，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，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。1968年1月以“现行反革命”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，以“现行反革命”罪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
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。

经本院再审查明：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，判处死刑，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，应予纠正，据此改判如下：

一、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理委员会（70）刑字第30号判决书。

二、宣告遇罗克无罪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，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。

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由于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，我的心在颤抖着。眼睛紧紧盯住那七个字：

宣告遇罗克无罪。

历史宣告了他无罪。

历史是人民写的。

历史只允许他活了27岁。

历史还将宣告他是“烈士”、“理论家”、“思想家”、“实践家”……然而，我盼望这些他受之无愧的名称吗？不。

我不想对我的哥哥给予任何评价。在我的身后有十亿中国人民——由他们去说吧！我只有一件责无旁贷的、十年来一直想做的事——用我这支笨拙的笔，凭着浅薄的思想、直觉和感官、去写写哥哥这位普通人，去写写他都干了什么事。

他只有 27 岁。

但他的生活经历、生活给予他性格的陶冶、他所做的事情，即使是年龄比他大一、两倍的人——如果庸庸碌碌过活的话，也不能与他相比！

.....

死囚牢.....

哥哥被关在腐臭阴暗的“活棺材”里。一米宽、二米长、双层铁条门，下面有一个塞饭的小口。没有棉被、没有一切洗漱用具。夏日蚊蝇叮咬，虱蚤遍身，30 斤重的镣铐更添了这些“小吸血鬼”们的狂妄和自由。严冬，没有火炉，寒风无遮拦地从铁门条吹入，浑身冻得麻木生疼。一间间的死囚牢关着待死的人。有的人疯了，吼叫声、求饶声使人毛骨悚然，足以使正常的人发疯……何况还伴随着肉体的摧残，在两三个月之中，哥哥和一些政治犯天天被拉到各大厂校机关去挨斗。他们的嘴唇虽被封闭着，但哥哥每次都用他那单薄无力、久已虚弱不堪的身体，死命地向上挣，决不肯低头。押着他的彪形大汉踢他、打他，台下的群众啐他、骂他；手腕脚踝全破了，镣铐无情地蹭磨着鲜血淋漓无法愈合的伤口，每天批斗回来，血迹斑斑，浑身青肿，活人像死人一样被拖进牢房。那滋味儿，不比死更难受吗？而哥哥是怎样惊人地在死神和魔鬼们面前，昂着他那不屈的头呵！他全身浮肿了，忍受着疾病和酷境的折磨，忍受着刑后的创痛，忍受着精神上的种种刺激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寒冷的长夜……也许他精神分裂了？失望了？怀疑了？消沉了？不！他没有！他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，他想活下去，活下去！他唯一挂在心上的，就是琢磨着如何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上层领导人。他在狱中五次上书毛主席，给陈毅同志写过信，希望能有一线生机……



能尝到的滋味都尝到了，该考验的都考验了，没有谁能征服哥哥的意志。是的，没有人能征服他的心！

哥哥，这位在人间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，用这首诗赢得了“监狱”一课的满分：

赠友人

攻读健泳手足情，
遗业艰难赖众英。
清明未必牲壮鬼，
乾坤特重我头轻。

人间大学的每一堂课他都上得那样认真。如果说“当人刚脱出自然界怀抱的时候，他只是个自然人，而不是人。人乃是人、文化、历史的产物”的话，那么，哥哥是达到了人的水平。

这名优秀的学生，已经被准予毕业了——1970年3月5日，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10万人。各个单位都必须有人来参加，看台上、田径比赛场上都是人。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，在万人高举的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，每五个警察押着一个。所有男犯人全被剃光头，胸前挂着大牌子。

口号停止之后，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。他每念一个名字，就停顿一下，于是五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，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（防止犯人呼叫），强迫他抬头示众，然后把头压低下去。有几个犯人（包括哥哥）坚决不肯低头，

就有另一个警察过来用拳头狠狠地捶他们的头。宣判词全很短，三言两语，最后全是这样一句话：

“该犯罪大恶极，民愤极大，依法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”

19个犯人全部宣判完了，主席台上那人说：

“以上各犯，均报请最高法院批准，验明正身，现在绑赴刑场，执行枪决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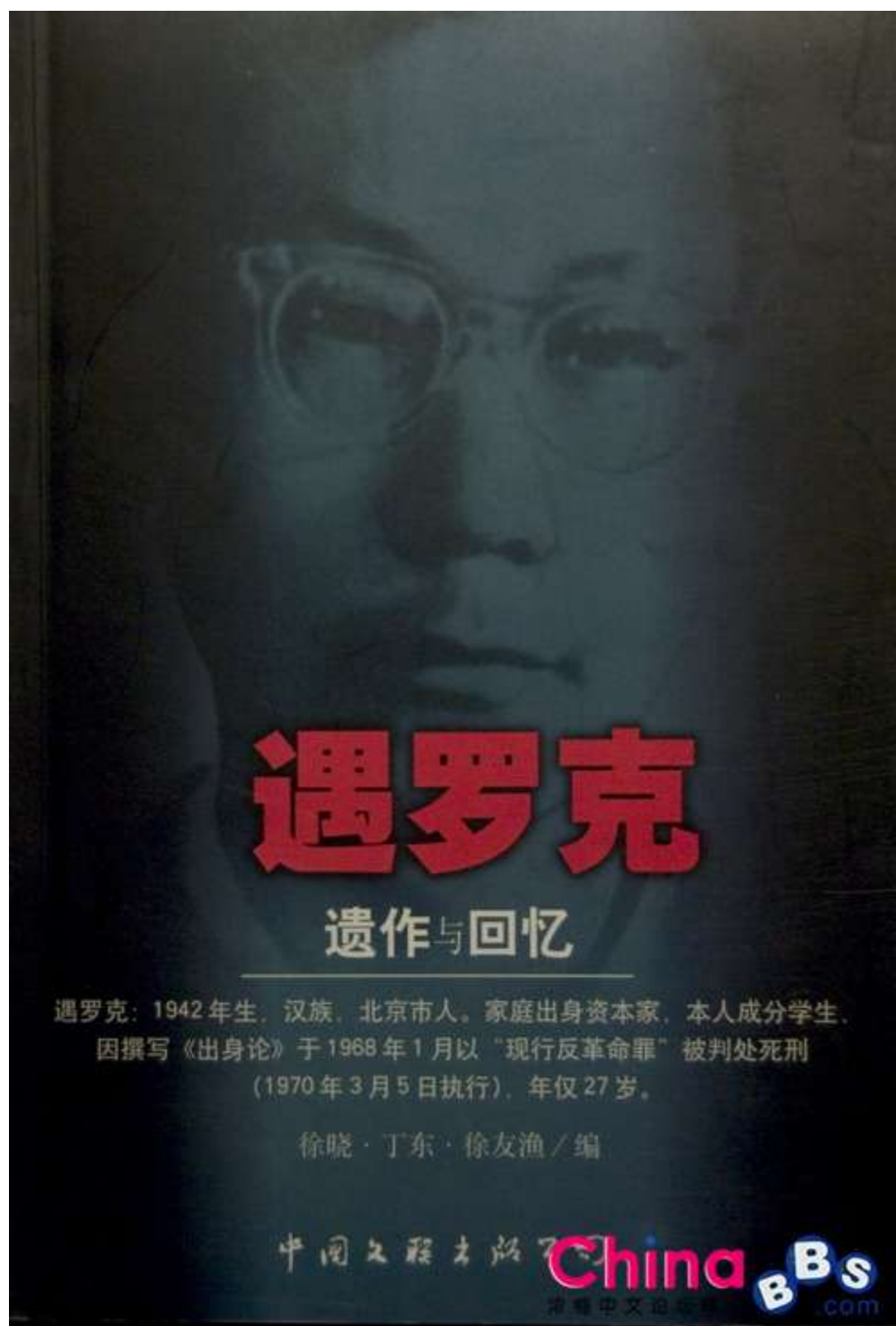
话音未落，95名警察一起用力，一下子19个人全跪在地上。在几个迅速的动作之后，他们全被五花大绑地拖了起来。这时观众席上、运动场上，激昂的口号声又响了起来。犯人们被带了出去，有的已经吓昏了，被警察拖着，尘土带起几丈高。哥哥拼命地挣扎，他不肯低头，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，几个警察吃力地推他，这时候人们清楚地看见：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，仍然不屈的奋斗着……



1967年，遇罗克刑前最后的留影

哦，哥哥死了！永远不会再回来了！他的名字，像过去的一些英雄一样，在祖国的大地上被亿万人传颂着。

我们纪念英雄，不希望热闹一阵子而烟消云散；我们纪念英雄，是希望一个人在生的时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，不要总是在他死后给他戴上桂冠；我们纪念英雄，是希望每一个人自省——使遇罗克走上刑场，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？单凭“四人帮”能杀死遇罗克吗？万一将来另有一个“四人帮”式的人物上台，在工人体育场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？我们纪念英雄，是希望像他那样勤奋地苦读、勇敢地实践、冷静的思考、明确地生活！



中华读书报

1999年05月26日

遇罗锦影踪

作者：李相



遇罗克临刑前一个月，姐遇罗锦、弟遇罗文、遇罗勉分别前合影，姐姐要回教养院，弟弟要回陕北农村（1970年3月）

遇罗锦的名字曾轰动一时，但很快就烟消云散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也饱经磨难，又比她的哥哥遇罗克多了一层婚姻的不幸。

几年的“劳教”释放后，她先是到河北邢台插队，那里十分贫穷，难得吃顿饱饭。父母惦念这唯一的女儿，想早点给她找个对象，也使她好有个依靠。对这个“对象”，她先是不同意，对方也没强求，只说了句“你看着办”。生活的困厄使遇罗锦丢掉了最后一点自尊，她攥着仅有的10块钱，扒火车到黑龙江莫力达瓦旗汗古尔河乡，投奔同是北京去的知青“对象”。

那是个比较富裕的地方，一般外来人口不轻易被接收。她凭着“未婚妻”的身份，她的“对象”凭着1.90米威风凛凛唬人的个头，愣是把遇罗锦安顿下来。后来他们结了婚，有了一个孩子。他们之间没有爱情，有的只是生活的需要。不久，他们离了婚，遇罗锦回到北京。

在北京，遇罗锦先是画彩蛋、灯笼纸维持生计。经人介绍，她又嫁给一个电工。这个工人老实本份，也很疼爱妻子，但他们仍然没有爱情，在一起平静地生活几年以后也分了手。

1978年，有关方面为遇罗锦平反，她重又回到玩具六厂，搞设计工作。遇罗锦像哥哥一样，读过很多书。还是在小学五年级时，她写的一篇《欢乐的节日》就被报刊公开发表，成为当时学校里的一个美谈。

遇罗锦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和坎坷，她的心中郁积着太多的话，她要倾诉，要宣泄，有一天，她拿起了笔。她没日没夜地写，有时候已经躺下了，想起了什么，又披衣起床。直写到天明。多少次，写着写着，她会哭起来，哽咽着不能自持。她终于完成了纪实文学《一个冬天的童话》。作品发表后，她调到了北京市委的学习与研究杂志当美编。两年以后，又写出了《一个春天的童话》。

对这两部作品，人们有褒有贬，有的同情她的遭遇，感叹一个无名者初登文坛的才华；有的认为她是个没有良心的坏女人。不管怎样，她因此而出名，引起不小的轰动。

女儿、姐姐出了名，她的父母、弟弟们并未因此而显得多么高兴，反而多有不满意，不理解她为什么把家里人写成那个样子？

遇罗锦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有个性的人，家里人无从知道她的想法。在《一个春天的童话》中，她把母亲描写得很好，把父亲却写得很坏。其实，她母亲是很理性的人，没有过多的儿女情长，从女儿的

角度看，或许缺少些母爱；而她父亲是个感情外露的人，在四个子女中又尤其偏爱遇罗锦。对这些，她不会不感同身受，但又为什么偏偏把疼爱她的父亲写得让人难以理解呢？尽管女儿把他写得很不好，但老父亲没有一句责备的话，他的床头始终只摆着女儿一人的照片，在 1988 年辞世前的弥留之际，老人已不认识身边的两个儿子，但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，突然睁开眼睛，挣扎着看了一眼女儿的照片，这才永远闭上了双眼。此时，遇罗锦远在异国。

1982 年，遇罗锦和第二个丈夫离了婚。这件事还引起了一场风波。遇罗锦称“感情破裂”，基层法院判决离婚。她丈夫上诉到中级法院，称“感情没有破裂”。中法判“不准离婚”。这件个人私事引起了某杂志的一场讨论。有读者称遇罗锦是“女陈世美”。沸沸扬扬，最后仍然分了手。这个不愿离婚的丈夫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。

这个电工确实是个好人，在遇罗锦困难的时候有过帮助。但他们无论在思想、情趣、性格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，难以产生共鸣。他所以不愿和遇罗锦分手，这个妻子确实是个难得的女人：她生活简朴、善理家务，自己穿的衣服都是亲自设计、裁剪缝制。她把不大的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又很温馨。尽管脾气不好，但很体贴关心人。在笔者采访遇罗文时，他妻子不时插话：“姐姐是个好人，哪有她哪就有温馨……”

不久，遇罗锦认识了某大学的一个工程师，他们很快结了婚，1983 年，曾经翻译遇罗锦《一个冬天的童话》的一个德籍华人出版商邀请她到德国短期访问。后辗转定居在德国。15 年来她还没有回来过。

1986 年遇罗锦曾给国内的丈夫和弟弟遇罗文办妥了赴德定居的一切手续，但丈夫不愿离开祖国，不同意去。既然丈夫不去，她索性给弟弟写信“你也不要来了”。他们夫妻多年一直书信往还，遇罗锦过去还经常给他寄钱。这是个山东人，非常耿直，遇罗锦经常给弟弟们来信，要求他们多照顾他；在给他钱接济改善他的生活时，要注意方式，使他能够“坦然”接受。尽管已离别 15 年，他们依然保持着夫妻关系，遇罗锦始终关心着这个丈夫。

遇罗锦，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倾诉自己的人生经历，以不羁的性格在当时国情、社会氛围不被理解也不相容的情况下，追求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从而必然招至种种不幸和非议。她已经离开祖国 15 年了，在异国他乡她会回忆起这些往事吗？……

（摘自《今日名流》1999 年第 5 期的《遇罗克兄妹的人生片断》，李相文）